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日讲易经解义

「康熙皇帝听课讲义」



宋书功
◎点校
萧红艳

RIJIANG
YIJINGJIEYI



NLIC 2970713152

欽定四庫全書

日 讲 易 经 解 义

清·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仁皇帝钦定

(康熙皇帝之听课讲义)

宋书功 萧红艳 点校



NLIC 2970713152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讲易经解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宋书功，萧红艳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1.2

ISBN 978 - 7 - 80174 - 928 - 4

I . ①日… II . ①宋… ②萧… III . ①周易—研究 IV .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833 号

日讲易经解义

宋书功 萧红艳 点校

责任编辑 刘 婷

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

出版发行 中医古籍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印 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7.875

字 数 5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4 - 928 - 4

定 价 46.00 元

点校《日讲易经解义》卮言

《日讲易经解义》一书是清康熙帝“特命儒臣，参考诸儒注疏传义，撰为解义一十八卷，日以进讲，反复卦爻之辞，深探作易之旨”，是一部专为康熙帝讲授《易经》的讲稿，由翰林院学士牛钮、孙在丰、张英三人为日讲总裁官，又傅腊塔等十八人担任分撰官，分工派务，每天进讲，最后由康熙帝钦定作序而成是书，后至乾隆时命纪晓岚等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乾隆帝又命王际华、于敏中等从《四库全书》中遴选出七分之一的精品，成《四库全书荟要》一套，专供乾隆帝一人研阅收藏，存放于乾清宫后御花园内别人不能涉足的乾隆帝作为休息之所的摛藻堂中。后时移事迁，列强入侮，帝制腐亡，华夏兵荒，此丛书消息早已淹没无闻。1924年北洋军阀政府清点故宫文物图书时，在摛藻堂内的字画杂物堆中发现了这套丛书，完整无缺，触手如新；后国民政府将其运到西南，后国民党窜逃之时又将其运到了台湾，从此这套绝世无双的孤本丛书就独存于海峡一隅了。

《四库全书荟要》是专为乾隆皇帝一人编纂刊刻的一套大型丛书，是极为难得的绝对孤本，所以它与《四库全书》比较起来，更有其胜出的特点，首先，它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纸张油墨、缮写刊刻、审核校对等均不惜资费，可谓人间极品；再有，这部绝对孤本的丛书，几经战火，却能完整无缺，纸白墨润地保全下来，也堪称天壤间的稀世珍宝了；还有，《荟要》所据版本，一是内府武英殿刻本，二是内府所藏历代善本珍本和抄本，三是从民间征集来的善本和抄本，其版本价值极大，其所收图书皆为秦汉以来的所享盛名的国宝经典，故在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方面都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更应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在编《四库全书》时，古籍中凡有不利于满清政府统治的内容，编修官可任意加以砍削和删改，而《荟要》是给乾隆帝一人看的，不需要删改，故所收图书都能保存其本来面貌，这是极其可贵的，《荟要》所收图书虽只《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书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因此，《荟要》要比《全书》真实可信，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就更让人感到珍贵了。我在点校中尝与文津阁本、中华书局等四库全书板本对照，发现诸本皆有讹缺，然与此荟要本加以对照则群疑冰释，诸讹皆得以校正，因此它是校勘古今诸书最可信赖的板本，其学术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荟要》现在还阻隔于海峡一隅，所以我们还不能得见庐山，再则由于它是稀世国宝，即使没有海峡阻隔，人们也难睹其真容。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其影印出版，2005年吉林出版集团又将其影印，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心理得到慰藉。故为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特此先行点校出版，以饗读者。至于对此书的进一步研究，权且请俟来日了。

某日友人携《影印四库全书荟要》中之《日讲易经解义》及《日讲四书解义》见访，意欲将其点校出版以飨大陆读者。手捧新书，纸香诱人，虽是影印，亦颇难得，甚感畅快，欣然乐从。

《日讲易经解义》是专给康熙皇帝讲授的讲稿，没有相当的才学和胆识者是不敢当此大任的，可见这些日讲官们于此道当是清儒中的佼佼者。自汉以来历代大儒讲述易学义理者数以千计，至北宋程颐《易传》、南宋朱熹《周易本义》，儒学《易》义已成道统，后儒秉承之，至康熙帝的日讲官们，这帮清儒当是儒学易道之集大成者了。如此，则其《易经解义》于今在学术上亦颇有研究之价值。

给康熙帝解义《易经》的日讲官有二十一人之多，分担着《易经》中六十四卦、《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自不同章节的解义任务，但其主旨是相同的，主题方向是一致的，可以用《帝王政治易经》作为他们解义的共同题目，都是从明君贤臣、君子小人、抑恶扬善、趋吉避凶、大治天下、和谐社会等方面来解说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方法和民族人文精神，是有其借鉴作用和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六十四卦乾卦为首，在上经乾卦卦象列出后，日讲官对六十四卦的内容有一大段概述，其开头写道：“伏羲画卦，有画无辞。自文王系《卦辞》，周公系《爻辞》，孔子作《彖传》及大小《象传》、《文言传》，而卦之理无余蕴矣。”这里首先交代了六十四卦的内容及其作者，接着，按先后顺序概述了这些内容的中心大意：“卦辞统论一卦之吉凶，而彖传则或言卦体，或言卦德，或言卦变，或言卦象，皆所以推明卦义，与卦辞相发明者也。至于爻辞，或六爻合撰，或各爻殊趣……”

日讲官们在解说各卦或各爻时都先来一段总的简述，然后以上述作者的名义将其解说叙写于后，如文王某卦象辞曰、周公系某爻爻辞曰、孔子系某卦象辞或某爻象辞曰等等，其实都是日讲官们将自己的理解托古圣之口叙述出来。笔者在点校时据以划分其段落层次，以方便阅读。

本次点校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 原书为竖排本，现改为横排本。

- (2) 原书无标点断句，现一律加上标点符号。
- (3) 原书中繁体字、异体字、俗体字等，一律用简体字排印。
- (4) 原书各部分内容不分段落层次，现据文意划分出段落层次。
- (5) 点校中尝与《四部备要》中华书局本、《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及上海古籍本等版本对校，结果令人惊奇地发现：诸本皆有不同程度的讹缺，唯此《荟要》本无丝毫之讹误。可见其精校刊之质量之上乘，亦可见其版本价值之珍贵。基于此故亦无须出校注了。

点校甫毕，友人说：你若有什么话要说，可借此机会发表出来。我对《易经》没有什么研究，写不出什么论说性的文章，只是有些疑惑不解的问题正好就此机会请益于大方之家。

一、八卦是不是伏羲画的？历史上有没有伏羲这个人？

自汉以来，直至当今，古今的《易》学家们都说八卦是伏羲画的，日讲官们亦说“伏羲画卦，有画无辞”。那么八卦是不是伏羲氏画的呢？历史上有没有伏羲氏这个人呢？

1923年5月，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了一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史坛。顾颉刚潜心研究，指出周代人知道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了尧、舜之名，到战国时有了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了伏羲，到汉以后又有了燧人氏、有巢氏、盘古氏等。他总结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顾颉刚不仅理顺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人造古史的过程，而且揭示了人造古史的规律。这反映了古人对人类的起源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因此才虚拟出这些假想人物。盘古开天地，天地生人，这是古人对人类起源的认识；有巢氏，说明人类穴居栖巢的时期；燧人氏，说明人类已学会用火；伏羲氏，说明人类在游猎时期能征服野兽，并且已能豢养牲畜；神农氏，人类已由畜牧经济时代开始了稼穡耕种的农业经济时代；黄帝，黄是土地，帝，据郭沫若考证是女阴，在古人心目中黄帝是生养万物和人类的圣人。后来人们又不断给这些假想人物按常人之情编了很多故事，司马迁又把这些传说人物当作信史来写，于是后人就以为是真的了。其实这是很幼稚可笑的。伏羲时代应该是几十万年前了，那时的人类还处在不衣而裸，茹毛饮血的时期，怎么知道去画什么八卦呢？

二、八卦是来源于半坡先民祭坛上鱼的布局图吗？

八卦是来源于半坡先民祭坛上的鱼的布局图。这种说法本人表示赞同。不知今之持伏羲画卦之说的易学家们对此有何见教？根据中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人类最早的文化是生殖崇拜文化而不是什么卜筮文化。而在生殖崇拜中又以女性生殖崇拜为最先。半坡先民是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因此他们实行女性生殖崇拜，用象征女性的鱼祭祀祖先神灵，这从半坡出土的鱼祭彩陶盆得到证实。

《周易·系辞下》第十二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圣人是谁？按照道统的说法显然指伏羲了。汉儒孔安国、刘向等对此作了神话性的解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筮法。夏禹治水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右二，前左四，后右六，后左八。纹如文字，禹取法而作《洪范九畴》”。

我们剔除其中神话性的成分，亦可探知河图与八卦的消息。作《易传》者这里实际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①八卦来源于河图，②先民在实行生殖崇拜祭祀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为趋吉避凶的占卜文化。那么，河图是什么呢？《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其已矣夫！”看来河图的神话在春秋已经流传，当时还没有编出伏羲画卦的神话来，只是当作预示吉凶的祥瑞之物，孔子没有见过，所以他发出这样的哀叹。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赵国华在其所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通过对半坡出土的母系氏族后期彩陶盆的研究，精心地、细致地、科学地论述出河图就是半坡先民实行女性生殖崇拜的祭坛上九组鱼的数据和方位的布局图。半坡先民实行女性生殖崇拜是用象征女阴的鱼来祭祀，最初是用实物，在祭坛上有九组鱼，即有九个分布区，每个区处于不同的方位，且每组鱼又各自有不同的数据。后来，半坡人能烧制彩陶了，就用九件有鱼纹的彩陶为祭器。每件彩陶上的鱼纹数代表着原先实物祭祀的用鱼数。

现在我们请看下图：

中间图2是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图中所绘鱼纹是抽象鱼纹。图1是从图2改形出来的河图，它是祭坛布局的象、数、方位的纪录图，而后独立成图，即为今之河图。图3是由半坡鱼祭祭坛布局图分离出来的数据图。

半坡先民实行生殖崇拜的鱼祭，既是为了祈求生殖繁盛，但是由于其对神灵的敬畏感，因而也是为了趋吉避凶，这就由祭祀文化自然地产生了占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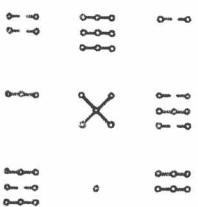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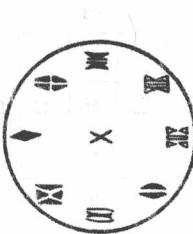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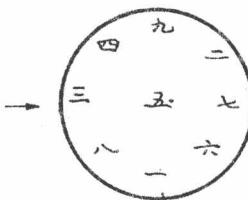


图3

半坡鱼祭祭坛布局与“河图”的渊源关系图

图1.“河图”改形图与半坡鱼祭祭坛布局的内在关系 图2. 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中所绘为抽象鱼纹） 图3. 半坡鱼祭祭坛布局分离出的数据图

文化。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祭坛布局分离出“河图”之后，则直接演变成八卦方位图，即八卦母图（见图4）。赵国华指出：“这包括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八卦八个符号系由半坡抽象鱼纹演化而出，二者有相同或相通的‘象’（形）；二是八卦八个符号的原始数字意义，亦由相应的半坡抽象鱼纹的数量意义直接引出，二者的‘象’表示‘数’的方法和规律呈现出一致性；三是八卦的八个符号具有方位意义，其原始方位意义系根据绘有相应抽象鱼纹的彩陶在鱼祭祭坛的位置而确定下来。例如：

☰乾九为上南，☷坤一为下北，☶艮三为左东，☱坎七为右西，☱兑二为东南，☳震四为西南，☲巽六为东北，☲离八为西北。这样，八卦从何而来，再清楚不过了。它从事实上否定了伏羲画八卦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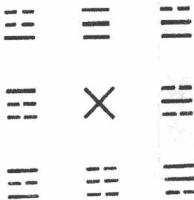


图4 八卦的“母图”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5 周人明堂中包含的“河图”数据

半坡先民鱼祭祭坛的布局图——河图，不仅其方位意义具有其神秘性，其数据意义更有其特殊的神秘性，它上下、左右、横向、斜向的三个数相加之和，分别都是十五。这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大戴礼记·盛德篇》所载周人明堂制度：“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见图5）。又《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用三、九、七、一、五这五个数字分别表示东、南、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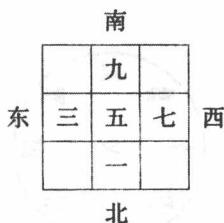


图6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河图”数据与方位关系

北、中五个方位，显然也是借用了河图的数据（见图6）。又如《灵枢·九宫八风篇》首图（见图7），也完整地有河图的数据与相应的九个方位。还有，半坡先民原是用筮草占卜，这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而到父系氏族社会，乌龟是男根的象征，实行男性生殖崇拜，龟甲也就成了推占吉凶的占卜之具。乌龟背甲中央一列脊甲正好五块，左右肋甲板就依河图数据九、四、三、八和二、七、六、一（见图8）。



图7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首图

还有，河图在汉后用于军事上有八阵图（见图9）。其中令人神奇的是八个纵行相加的和都是二百六十。河图的方位和数据那么神奇，难怪会编出“河出图，洛出书”那样的神话。

也许有人会问，半坡先民鱼祭祭坛上的鱼有九个分布区，而八卦只有八个区，这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八卦的中央区及其所代表的数据五被省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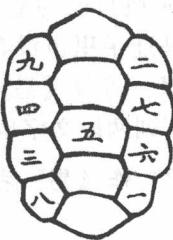


图8 乌龟背甲与“河图”数据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6	15	14	13	12	11	10	9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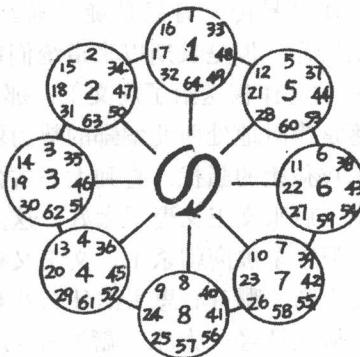


图9 八阵图

三、八卦是文字的雏形吗？还是用文字给它命名？

古今的道统家们为了神化《易经》，说《易经》是文字的雏形，实乃吹嘘之词。河图、八卦，先民只是用其数据和方位行占卜吉凶之事，没有文字也无妨于占卜。郭沫若在其所著《周易之制作时代》中说：“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准确地说，今传八卦之名应是文字产生之后，由《易经》之制作者依据其卦形、方位、数据，即作《易》者所赋予的涵义而命名的。如☰乾卦，它所象征的是天是金是玉，郭沫若说：“金和玉两个字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字也是包含着的。”再如☵坎卦，坎所象征的是水，水的古字是三行斜淌着的流水线。中间是一条斜长线，两边各是两条相挨着的短线，把它们放正拉直，即成☱卦形。诸如此类，不必赘举了。请参阅郭沫若《青铜时代》之《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

四、《易经》的经部是文王所作吗？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了句“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话，这是借

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感慨自己的遭遇，显然是带有怨恨情绪的话。周文王有没有演《周易》，司马迁手里也没有证据，他在《史记·周本纪》对此也只是推测：“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句中的“盖”字就是推拟之词。再如下列两段文字也只是推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系辞下传》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同上第十一章）

这里，作《易传》者只是疑《易经》是周文王时代作成的，并没有说就是周文王所作。但是长期以来道统们都把这疑惑之词当作确定之词，而且把《易经》的著作权送给了周文王，那真是太抬举他了。

周部落是当时地处西北偏鄙的势力弱小文化落后的部落，经常受到商朝的打压和羌戎猃狁的骚扰，直到太王古公亶父时其子王季与商朝的诸侯国通婚娶了太姒，后来文王又娶了太姬，这才使周国融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东方诸侯国，但王季被商朝杀了，文王又被囚在羑里监狱，因此周人心中想的是复仇，是灭商，哪有心思去演什么八卦。

再说，从《诗经·大雅·緜》中可知周人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太王时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根本不具备写作《易经》那样高深文化的能力。即使文王本人，他虽然是一个部落的王侯，但当时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很贫穷，文化也很落后。《尚书·无逸》记载：“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又《楚辞·天问》曰：“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一个穿着卑劣服装种田打谷，披蓑衣拿着鞭子看牛放马的农夫，他能写出这种具有高深文化的《易经》吗？

郭沫若指出：《易经》中确实是记载了很多殷商时期的事情，但也有不少是春秋时期的事。如《夬》卦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卦六四的“中行独复”，就是写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被楚军打败，归而请死的故事，如果《易经》是文王所作，他怎么知道几百年以后春秋时的事呢？

五、孔子有没有读过《易经》？其时《易经》产生了么？

汉儒以至历代道统们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鼓噪，长期以来，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的迷惑，似乎应该认为《易经》是最古最老、最神最圣，应该居于群经之首。经生家又总是吹嘘什么汉学是朴学，注重实事求是。其实汉儒做学问是最不朴，也最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喜好托圣、崇古，兼之改字和杜撰，往往把古代典籍弄得面目全非，《诗经》是如此，《易经》

更是如此。孔子读《易》之说更是把《易经》推向了神圣的殿堂。

孔子有没有读过《易经》呢？自来把《论语·述而》中的这条语录为证：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在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多处认为此话是孔子四十七岁时说的，意即孔子五十岁学《易》。但“加我数年”，是一句生命紧迫感的话，一般是在垂老的晚年才会有此希求之语，四十七岁的人是不会有一种感觉的。再说“数年”是几年呢？应该是下文的五年或十年，才合文意，怎么能说成五十岁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指出：

“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就是说在《古文论语》中是写作“亦”，而在《鲁论》中于该句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这可谓是一句“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话，这就是说孔子根本没有读过《易经》。至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话那纯是后人由此编造附会而来，显不足信。

在《论语·子路》还有一条写孔子与《易经》有关的语录：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孔子说的！这是孔子对“南人”之语首肯，并加以赞赏性的发挥的话。它正好与《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相同。

在《老子》中没有引用《易经》的内容，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引用《易经》的内容，也没有出现《易经》二字，可见其时尚无此书。在孔子的嫡传子思、孟子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易经》的话，因此，这只能说明作《易》者在拟恒卦九三爻辞时引用了孔子的话，而非孔子引用《易经》之语。

六、《易》的经部是何人所作呢？

郭沫若认为《易》的经部是楚人駢臂子弓构成于战国初年。

汉儒说《易》书有三：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但前两种《汉书·艺文志》不载，郭沫若认为这是刘歆所为。而《周易》去掉“周”字，也就只剩下“易”了。汉儒喜好崇古非今，攀附圣人，拉拢古贤，来为其“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文王作《周易》之说护法。但由上述可知，文王根本没有作《周易》，那么，《易经》是何时何人作的呢？郭沫若从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所发掘的汲县魏襄王墓的出土品中获得了

消息。《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中说：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案当作魏襄王）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又杜预的《左传集解·后序》

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蝌蚪文字。……所纪大凡七十五卷。《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案哀当作襄，形近而讹）之二十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从上述这两条文献可知，在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时，《易传》即《十翼》是完全没有的，《易经》有《周易》和《易繇阴阳卦》两种稿本，它们可能从战国初年分别流行于南方和北方，此时已流行到一起了。相同的东西有两个本子，说明它还在制作阶段。但也可以断定，《易经》的最后完成也就在这个时期。至于师春抄集的《左传》里卜筮之事的集录，郭沫若认为是刘歆在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即刘歆将这些资料分别加上卦名，然后放置到《左传》中它们相宜的位置中去。不明于此，人们真以为在《左传》以前乃至更早就有《易经》这部书哩。

那么，作《易》者究竟是谁呢？

据郭沫若的考证，是战国时楚人駢臂子弘：“駢是姓，臂是名，子弘（又作肱）是字。是他把楚人的《易繇阴阳卦》带到北方，为迎合北方人的口味，将《易繇阴阳卦》改编为《周易》，因此就出现了相同的东西而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的现象。子弓是商瞿的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駢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自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

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文中所云孔子传《易》是汉儒攀附古人拉拢圣贤的伪托，这已是无疑不争的事实了。那么何以见得作《易》者就是駢臂子弓而非商瞿或其他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荀子》的《非十二子》中可以得到信任，因为荀子极端地称赞他，认为他是孔子以后的唯一的圣人：

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荀子是秦以前论述到《周易》的唯一儒者，在这里他把同时代的一切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像子思、孟轲，都一概摈除了，而把子弓和孔子相齐并论，加以如此超级的赞辞，可见他决非通泛人物，故能作出《易经》这种高难度书的人，非子弓莫属。”

七、《易传》是何人何时所作的呢？

《易传》非孔子所作，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易传》究系何时何人所作？在此只需把前贤研究的结果介绍给读者就可以了。王国维、顾颉刚认为是构成于西汉，吴虞《经疑》、钱玄同等认为是秦汉之际，而郭沫若对此有更精细的研究。

王充《论衡·正说》云：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这里说的逸《易》一篇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从老屋里发现的，因此不要误为汉宣帝时的产品，从文脉上看，它应是先秦的东西。对照一下《隋书·经籍志》，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这里说的《说卦》三篇，应该就是《论衡》里说的逸《易》一篇，它原来是合在一起的东西，当初本是一篇，并未分而为三。那么，它是什么东西呢？以下所录郭沫若氏的这段论述，向我们揭示了此中消息：

“据《束晳传》，汲冢的出土品中，已有‘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那么，在战国初年，便是駢臂子弓把《易》作成而加以传授的时

候，一定有过一种说明自己的假定与理念的一种《传》样的东西。《卦下易经》怕也就是他著的。那么《说卦传》以下三篇或者就是《卦下易经》的别一种的纪录。”

这就是说，《十翼》中的《说卦》、《序卦》、《杂卦》这三翼是战国时的产品，是秦王朝以前的东西，它的作者就是《易经》的作者騤臂子弓。

至于《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这七翼，根据郭沫若的研考，认为是秦代的东西。具体何人所作，那就难以考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是荀门后学楚人所为。其理由如下：

秦灭六国后，最想复仇的就是楚国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他们复仇的口号。秦始皇兼并天下后自称始皇帝，下了一道诏书：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种万世恒定、永远不变的思想就是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在当时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残酷统治下，一心想抗秦复楚的楚国学者，怎么来表达他们的反抗思想呢？《易经》是卜筮书，是不会被烧的，而它又是阐述变化之理的，于是聪明的楚国学者们就可以在传《易》中发表他们的叛逆思想了。而这正是《易传》创作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

《尧问篇》是《荀子》一书的最后一篇，其最后一段是楚国的荀门后学极赞荀子的，认为荀子是“孔子弗过”的圣人。从这段话里也可以看出这帮荀门后学们的反秦复楚的思想状况及精神风貌：

孙卿迫于乱世，麟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仪不行，教化不成……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

“示天下以愚”，这大概就是荀门后学“蒙佯狂之色”弄卜筮、作《易传》以表反秦之意的策略吧。

以上是郭沫若的考析，认为《易传》形成于秦，而顾颉刚认为比这还要晚，当在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之后。本文后面将述及。

八、《易经》是大道之流？还是大道之源？

现在书摊上讲《易经》的书，可谓版本众多，作者纷出，而且在封面上书名的上下左右大都有用不同色彩书写的这样一些文字：

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 大智慧

中华文化的发端 天地智慧的源泉

好像没有了《易经》，就没有了中华文化；没有了《易经》，我们的古人就都是白痴，不知还要愚昧多少年才会开化。这纯粹是书贾贪财牟利的广告，卜者欺世盗名的吹嘘。

今有学者这样赞绝《易经》：

在人类轴心期时代，只有一本书是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只有一本书是为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那就是《周易》；在中国科学发展进程中，只有一本书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周易》。

《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此可谓对《易经》的三大绝赞，使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登峰造极，而我国上古的那些文化巨子就都被踩在伏羲这虚拟的鬼影的脚下。而其所谓“符号系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画，那是巫术道士用来占卜的，舍此也就没有这本书了；所谓“儒道共同尊奉”，此言谬矣，西汉时儒家为了扩大经书的范围，才把它拉入六经之末，后又推至六经之首；所谓只有《周易》“对人文和科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上古的那些思想文化巨子如老子、孔子、韩非、墨子、孟子等都没有听说过什么伏羲，没有提到过什么《周易》，又谈何影响？这样看来，这三绝之赞，实乃虚华不实之谬语。

《易经》中最能被道统们鼓吹为大道之源的是《系辞传下》中那段观象制器的话：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以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以上列举了十三卦象，有离卦、益卦、噬嗑卦、乾卦、坤卦、涣卦、随卦、豫卦、小过卦、睽卦、大壮卦、大过卦、夬卦。圣人观察了这十三卦象制作了渔网、耒耜、市场、衣服、舟楫、车辆、梆柝、杵臼、宫室、棺椁、

文字等十二样事物，概括起来涉及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政治、经贸、生活资料、文化等方面。这就是古代的道统们、今天的易师所鼓吹的《易经》是“大道之源”的依据，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天地智慧的源泉”的依据。

但是请仔细想想，观看离卦卦象就制造出渔网，观看乾坤二卦的卦象就制造出衣服而且天下就得到治理，等等，等等，这不是筑室沙上，造楼空中的玩笑吗？而且前后矛盾，牵强附会之状十分明显，前面说伏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但举例中却举了六十四卦中的卦象；说观象制器，但“日中为市”、“垂衣服而天下治”也不是器啊。还有，结绳是计数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二者之间并无什么大的联系，怎么看了夬卦就能造出文字来呢？

岂止牵强，完全是谎言。试想成千上万的汉字如果是从观看八卦甚至六十四卦中产生出来，恐怕连三岁童子都不会相信。如果说这就是什么“大道”，那么这个“道”也太低能了；如果说这些也算是大智慧，那么，这个智商值也太低下了。而为了吹嘘它是大道之源，是大智慧，不知杀死了古今道统训诂家多少脑细胞。

顾颉刚先生对《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写作时代更有独到的研究，他将《系辞传》分别与西汉时先后出现的《世本·作》篇和《淮南子》中的制器内容作对照，结果发现：

(1) 《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内容与《世本·作》篇的内容完全不同，说明《系辞传》出现比《世本》还要晚，否则《世本》会将其照抄无疑。

如：

《系辞传》：	《世本·作》篇：
庖牺氏作八卦	无
庖牺氏作网罟	句芒作罗（又《御览》引“芒”作“网”）
神农氏做耒耜	垂做耒耜，作耨（又《御览》引，“咎繇作”耒耜；又引，“繇作耒耜”。
神农氏作市	祝融作市
黄帝、尧、舜作舟楫	共鼓、货狄作舟楫
黄帝、尧、舜作服乘马	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作车
黄帝、尧、舜作重门、击柝	无（但有“鲧作城郭”）
黄帝、尧、舜作杵臼	雍父作杵臼
黄帝、尧、舜作弧矢	挥作弓；牟夷作矢
后世圣人作宫室	尧使禹作宫室
后世圣人作棺槨	无
后世圣人作书契	沮诵、仓颉作书

由上列二书内容对照可知，如果《系辞传》真是很古的书，那么《世